



基斯龍符

太行新華書局

美

幕內黨政美國

著基斯龍符·B

太行新华书店印行

美國政黨內幕

著者 B·符龍斯基

出版者 太行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三月出版

總店：	河南	涉縣
分店：	河北	邢台
	河南	焦作
	山西	安陽 新鄉 長治 左權

目 錄

- 一 美國政黨的特點.....(一)
- 二 美國的兩黨制度.....(八)
- 三 為建立美國第三黨的鬥爭.....(二九)

美國政黨的特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獨佔集團立刻就提出了公開擴張和奪取世界霸權的計劃。這些集團利用保守的民主黨和反動的共和黨所推行的內外政策，對工人階級的民主自由，他們的經濟和政治權利發動了空前大規模的攻勢。美國反動派的這一攻勢的目的不僅是希望把戰時經濟轉變為平時經濟的重擔放到人民大眾的肩上，而且企圖強迫人民大眾為美帝國主義的計劃而工作，以便造成對外政治冒險的『環境』。

由於在戰爭過程中獨佔集團與國家機關的聯繫日漸增強，獨霸國內社會政治生活的民主黨和共和黨成了美國獨佔資本的帝國主義傾向的直接表現者。這兩黨的反動份子在美國的執行和制憲機構中佔據着重要的職位，他們決定着國家的航路，把美國引向新的帝國主義侵略的道路。

美國的政黨，以其組織機構和在國內的地位而言，是政治組織史上獨一無二的。查理·勃德，著名的美國歷史家，在『美國政府和政黨』一書中寫道：『政黨的機構一代代地具有更大的包羅萬象的性質』，以致最後幾乎成了一個國中之國。

當政黨的腐敗墮落已過於明顯的時候，在它們的法規中就提出了某些改革。

特別是通過了調整政黨活動的專門法令。這種政府調整政黨活動的方策一直繼續到政黨在許多州內已公開為法律所承認並且已成了政府機構之一部份時為止。

因此，政黨的機構就成了政府機構的一部份。這種變化是適合着那一事實的，就是美國的政黨都沒有足以控制黨機構的固定黨員羣衆。黨和黨員的關係祇發生在最高政府機構的預選中。在民主黨及共和黨內，既沒有黨證，也沒有黨費。如要做這個和那個黨的黨員，根本不需提出任何入黨的申請。

每一個人的黨籍是根據他投票選舉那一黨的候選人而決定的。在選舉前幾個月內，每一位選舉人，如果他要投票的話，就必須登記。選舉人必須在登記時所發給他的選舉票上註明，他擁護那一黨，他準備投那一位候選人的票。同時，他還得聲明，自最後一次決選以來，他不曾參加過任何其他政黨的預選。然後，選舉人將選舉票封在信封裏，投入特設的木箱。選舉後一星期，再拆開信封，根據選舉人的聲明而編製每一黨的黨員表。

除了選舉人在預選登記時親自聲明外，還有其他的確定黨籍的方法。各黨機構時常在擁有選舉權的居民間正式徵收黨員。在南部各州確定誰是黨員的權力常常是授與黨務員的。

然而，這裏基本上保留着「臨時」的原則，根據這個原則，每一位選舉人可以在法定程序中，每兩年變換一次自己的黨籍。而這種黨籍的變換，非但黨員

即使發生在黨的領袖身上，也不會引起任何美國人的驚奇。例如，共和黨領袖之一威爾基，曾經是民主黨的活動份子。前商務部長華萊士及前內政部長伊克斯，從前都是共和黨員。所以，兩黨的黨員數量是一時增加，一時減少的。甚至黨的機構和活動份子的數量也是隨着黨運而變化。當某黨執政的時候，它的活動黨員就增加，反之，如果其他政黨執政了，活動份子的數量就減少。

那末，美國的政黨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在大多數州內，』美國歷史家勃德寫道，『某一黨在上次州選時能够收集到全部選票的一定的百分比，法律就承認它是一個政黨。』

例如，在紐約州，任何一黨祇要在上次選舉中該黨的州長候選人能收集到五千以上的選票，它就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政黨而參加選舉。如果它沒有得到這許多選票，那末它必須在選舉人之間重新收集必要數量的投票，以便參加下一次選舉。

美國政黨，尤其是民主黨及共和黨的主要工作，就在於爭取總統的席位、州長議員和國會代表席位。

每隔四年，夏天的時候（在十一月選舉前），各黨召集黨大會，提出總統候選人，並擬定政治綱領。這綱領涉及對外政策的問題，彷彿是未來的總統的一篇希望的總賬，而不是他的義務。

選舉揭曉後，總統根本不必遵守他在競選時所提出的政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保障人民工作法制委員會舉行辯論時，反動的民主黨員，卡脫·孟納斯柯無恥地說：『讓一位公正的人士讀一讀四十年來兩黨的政綱，我可以保證，他祇會說，如果這些政黨向美國人民所作的諾言都加以實現的話，美國早就毀滅了。』

領導職位的候選人的產生方法，在美國是各地不同的。在某些州裏，候選人的產生方法，是早在決選以前，就在各黨黨內舉行預選的。

最普遍的產生候選人的方法是提請求書。每一個要求作候選人的黨員，必須提出有許多黨員簽名的請求書。有時這需要一定的、預先規定的簽名人數，但大多是以本區投票黨員的百分比確定的。

還有這樣的方法：如果某人希望作候選人，他必須付出一筆特別的黨內基金，數額的大小是根據他希望獲得的職位的重要與否而決定的。在某些州裏，例如，在紐約州，候選人是由黨委員會提出的。

在為了通過選舉綱領和產生候選人而召集黨大會的時期，黨務由全國委員會領導。它舉行重要政治問題的會議，準備召集黨的例會，領導競選運動等。全國委員會由一主席領導，他並不一定是著名的領袖。美國政黨史上有許多範例，證明委員會的主席是傀儡人物，他執行着個別的黨內支配人物的命令。

黨機構中的特別重要的一環是州黨部。州黨部委員會的主席也多是二等角色，由實際領導人物在背後指揮着。州黨部通過自己的代表來領導競選運動；提出候選人、規定選舉人的手續、進行預選和決選。

黨的地方組織形式上由特選的機構領導，實際上主要的黨員羣衆是完全被動的，所以政治活動成了集團人物的獨佔場。

查理士·德文特在一九四四年紐約出版的『黨魁』一書中指出，『美國的政治機構製造着領袖、法官、制憲會議和國會的議員而幾乎沒有選舉人的直接監督。在某些城市裏，它讓一個黨魁十一『boss』（在英語中原意為『主人』）。此處是指那些擁有無限的獨裁權力的黨魁。……通常沒有任何正式的職位，然而却掌握着整個黨的機構。）或由他的兩三個黨徒獨裁地控制着各方面的市政生活，並且在選舉州長和議員時具有極大的優勢。』

把選舉人引誘到自己這方面來是用各種不同的方法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Bosses』一書中指出，為達到這個目的，黨的地方領袖利用了『直接和間接的賄賂、捐款給教會、向婦女獻殷勤、出借農具或者親切地報告商業新聞、緊逼債務，以宣佈別人的道德上或經濟上之秘密為要挾的恐嚇，以及散播謠言和謠語等等。』

在許多城市和城區裏，『Boss』們都能够保證自己在黨機構中的獨裁權。

所有的候選人都決定於『Boss』。因此，地方黨集團的領袖，選舉委員會等都完全掌握在『Boss』的手中。甚至州長、檢察官、法官也同樣受着他們的控制，因為這些官員的改選都完全由『Boss』決定的。在這樣的環境中，『Boss』們擁有着極大的權力，他們可以幾十年保牢自己的地位。

另外一方面，『Boss』還有各種『手段』以對付不服從他的人們，其中如：罷免職位、造謠、誹謗、恐嚇、罰款、監禁、暗殺等。『Boss』們總是和盜匪流氓等聯繫着的。盜賊和流氓的賄賂是收入的重要來源，而盜匪們又是選舉運動中的重要支柱。

消滅這個機構，驅逐這些流氓和盜匪是很困難的。要推翻『Boss』，必須他的敵人肯贊助，而這些敵手們也好不了多少。

黨機構化費在準備選舉運動上的鉅大的支出，是不能以下級黨機構的收入來彌補的。所以，黨的全國委員會就資助州委員會，而後者再資助區委員會。在選舉運動時，支出特別鉅大。例如，共和黨在一九四〇年的總統競選運動中支出一千七百萬元。據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統計，在一九四四年，自一月一日到十月二十三日，委員會共收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元（各種捐款不計在內）。在同一時期，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收入為一百〇九萬三千元。

彌補支出的來源主要是個別人士的鉅額的捐款。在一九四四年向共和黨全

國委員會捐款的人物中，有這樣的大資本家和金融巨頭；大化學托辣斯首腦杜邦、煤油公司老闆比尤、「通用汽車公司」代表毛根等。金融巨頭和「美國鑄鐵公司」的經理斯特拉斯是共和黨選舉委員會的領導者之一。Peter Clegg 布油公司的老闆鮑利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會計部長。

美國的兩黨制度

代表美國大資本家利益的民主黨和共和黨表現着所謂傳統的兩黨制度，這是美國政治生活的主要特點之一。這兩個輪流執政的資產階級政黨的任務，就在於造成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似乎存在着不同和鬥爭的印象，使兩黨瓜分選民的投票而不讓第三黨成立。

列寧在『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和意義』一文中指出了這兩黨的競選鬥爭的特點，他寫道：『自從黑奴解放以後，兩黨的區別已日益模糊了，……這個鬥爭對於人民大眾沒有任何重大意義。人民被這兩個資產階級政黨的象徵的和空虛的『決鬥』所蒙蔽而忽視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又說：『這種統制着美國和英國的所謂「兩黨制度」，是阻止獨立的工人，即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崛起的最巧妙方法之一。』

列寧的指示使我們認識了美國兩大政黨的相互關係。美國的其他政黨都起不了這樣的作用。小政黨有時雖也獨立地參加競選運動，但它們還從未獲得過決定性的成就。在美國歷史上，沒有一位總統是由第三黨的候選人所選出。

民主黨成立約在一百五十年前。民主黨的創立人是美國民主主義的鼻祖湯麥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共和黨成立於一八五四年，距美國內戰開始前

不久。第一個共和黨的總統是林肯，於一八六〇年獲選。內戰結束後，共和黨起而袒護大資本家的利益，出於後者的支持，它有一個很長的時期在國內佔着領導地位。

最初，作為北部產業資本家的政黨的共和黨，是與農業的南方的政黨相敵對的。但後來，由於工人運動的崛起和增長以及南方工業化的結果，兩黨間的區別日益減少了，有時幾乎消失了。

克利夫蘭（Cleveland），內戰後第一個民主黨的總統，實際上是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候選人。為了對抗進步力量和保證自己的候選人在一八八四年的總統選舉中獲選起見，民主黨員與一部份共和黨員在民主黨候選人克利夫蘭的周圍聯合起來，而後者就當選為總統了。

然而，在一八八八年選舉中，民主黨遭遇了失敗。從此直到一九一二年，民主黨的候選人祇有一次當選總統（一八九二年）。在一九一二年的總統選舉中，由於共和黨內部的分裂，民主黨獲得了勝利，威爾遜（Woodrow Wilson）被選為美國總統。

一九一六年，民主黨在「威爾遜使我們避免戰爭」的口號下又提出了威爾遜為其候選人。小資產階級、農場主人、許多工人、以及德國人和他們的盟友們都囑望於他。共和黨則提出主戰派愈斯為候選人。威爾遜以九千萬票當選總統。

但選舉後不久，在一九一七年的四月六日，美國就向德國宣戰了。國內民衆對美國參戰的不滿日益增加，這種不滿的情緒在一九一八年的國會選舉中表現得特別顯著，當時共和黨員獲得了國會的大多數席位。

自一九二〇年起，又開始了一段長久的共和黨統治的時期。共和黨候選人哈定（Harding）取得了極大的勝利。一九二四年共和黨提出柯立芝（Coolidge）為候選人（由於哈定的猝死，他自一九二三年八月起已進入白宮），並且當選了總統。在一九二八年的總統選舉中，共和黨提出胡佛（Hoover）為候選人，他打敗了民主黨的候選人斯米特。但這是共和黨統治的最後四年。

一九二〇年共和黨的執政是以「建立工業的正常條件」和「健全的管理」的計劃為基礎的。由於當時國內的混亂局勢，美國人很滿意這些口號。共和黨政府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三年的期間，把美國的對外政策轉向了加強美國金融資本的威力，增加對外貿易和國外投資的道路。到一九二六年，美國投資已達一百三十億元（戰時貸款不計在內），其中約有百分之三十是在歐洲。

共和黨曾預言，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的「繁榮」時期可持續「數代之久」。然而，到一九三二年美國人民就遭遇了美國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這引起了美國人民的普遍不滿，而這種不滿，部份地表現在一九三二年選舉上，當時共和黨遭受了慘敗，以致在此後的許多年中，都不能取得政權。

自一九三二年起，由於經濟危機和連帶而來的共和黨的政治破產，民主黨的影響重又增強了。在這一年的總統選舉中，民主黨贏得了光輝的勝利；它的候選人——佛蘭克林·羅斯福——獲得二千二百萬票，而胡佛僅得一千五百萬票。羅斯福執政後，宣佈了美國政策的『新方針』，並從事實現這個計劃。

在美國，競選獲勝的政黨通常在國會、州制憲機構和執行機構中都保有着很大的力量。一九四〇年，羅斯福是在民主黨佔有衆議院和參議院的大多數席位的環境下繼任總統的。然而，這個大多數幾乎毫無意義。在二百二十二名民主黨員——國會議員——中約有一百人是南部各州的代表。他們與共和黨員一樣堅決地反對着羅斯福的新政策。

因此，國會中形成了反政府的優勢。這些反對派在國會中給羅斯福總統以一連串的打擊。國會利用它的批准或否決支出預算的特權，肅清了『新政策』時期所建立的許多機構。

同時，共和黨失敗後，漸漸成了一切反動份子和渴望帝國主義擴張、企圖獨霸世界的國內孤立派的活動中心。特別明顯地表現着這種傾向的就是所謂『老衛軍』，它的首領是胡佛和塔虎脫，他們自從戰爭結束，打敗法西斯主義後，已變成了公開的帝國主義者。在他們背後站着美國的大資本家。

『老衛軍』的首領們在保守『中立』和『不干涉』的面具下一直推行着與希

特勒妥協的政策。胡佛的整個活動就在於爭取希特勒與西方列強妥協而使他的優略刀鋒轉向東方。

一九四〇年六月，胡佛在共和黨大會上，提議塔虎脫或杜威為美國總統候選人。據胡佛的意見，他們是能够執行他那與希特勒妥協的政策的。然而，由於法國的投降，塔虎脫和杜威的地位大大削弱了。孤立派的杜威曾在一九四〇年四月輕率地向報界代表宣稱，政府應當向人民保證，「美國決不直接或間接地參加任何戰爭、以及交戰國之間的任何談判。」

還有第三位人物——威爾基，他代表着那關心國際貿易和金融的集團。他對法西斯侵略者是採取不妥協態度的。威爾基曾斷言，如果他做了總統，將比羅斯福更堅決地防止法西斯主義的威脅。

然而，民主黨又獲得了勝利，羅斯福又做了美國的總統。

在選舉運動之後，共和黨內開始分出了「孤立派」和「國際派」，前者以胡佛為首，主張和法西斯主義妥協，後者以威爾基為首，力主國際合作。當時，杜威採取着中間的、中立的態度，這顯然是企圖避免與左右兩翼衝突。由於威爾基的影響日益增強，由於他的周圍團結了黨內的進步力量，「老衛軍」在戰爭的問題上開始表現了某些讓步。

一九四二年四月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通過了威爾基所作的決議，其中說：「我

們不承認任何和平。除非是勝利的和平，我們在未獲勝利前決不提出任何和平的建議……我們自覺到，戰後國家的責任並不局限在美國領土之內，我們的國家還應該協助去爭取世界各國間的相互了解與相互尊重法律和習慣，以免戰爭的陰影重新威脅我們和一切愛好自由和平的民族。』

許多人把這個決議讚譽為共和黨的新方針和孤立政策的結束。共和黨的『紐約先驅論壇報』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初，歡迎這一決議時寫道：『這些非常實際的政策宣佈了它與「媾和派」脫離關係，永遠埋葬了孤立主義並且使黨面向了未來。』

然而，威爾基派在共和黨內的勝利為期極短。『老衛軍』不但不肯讓出，而且還企圖鞏固自己的地位。在威爾基訪問蘇聯和中國期間，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邀請了三個新的反動派參加其機構，並授予重要的職位。克拉倫斯·凱爾特，帝國主義的孤立派和親法西斯組織『美國為首社』的積極份子，受任為全國委員會的行政指導和宣傳部長；謝謬爾·培頓基爾，『美國為首社』的活動份子和法西斯的『爭取立憲政府委員會』的首領，被任為財政委員會主席；佛克蘭·哈納脫，反動份子，親法西斯報紙的出版人和『爭取立憲政府委員會』的創立者，也加入了全國委員會的組織機構。

到一九四二年的國會選舉時，共和黨的力量大大增強了，並達到了很大的成